

名家专栏

湄江的春天

叶辛

叶辛,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蹉跎岁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入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系列丛书。电视剧本《蹉跎岁月》《孽债》《家教》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我和贵州的几位作家,从遵义市区前往湄潭县。当时被告知,午饭后出发,沿着湄江边的公路走,傍晚可抵达湄潭县城。

山乡公路正在维修,面包车开得很慢。进入湄潭县境时,山水风光秀丽起来。一位作家先由衷地发出一句:静静的湄江。另外一位作家跟着道:风光如诗如画。第三位随即跟上一句:翠绿的茶园,景色渐入佳境。

第四位年长一些的作家,显然是个茶客。他干脆形容起湄潭的茶来,说湄潭的绿茶,清香四溢,喝过之后,滋味令人难忘,是真正的好茶。我唐突地发问:和浙江省产的龙井,哪一个更好?

年长的作家道:龙井茶的炒制方法可能比湄潭茶好一些,但湄潭茶叶的质量,我敢赌不输于龙井茶。

那年头我只在口渴时随意泡点茶喝,对茶叶不甚讲究。只因有亲戚时常送碧螺春来,对碧螺春情有独钟。话题没有进行下去,只是透过车窗,望着湄江两岸的美景,喃喃自语地道出一句:湄江的春天,真正的是有种欣赏过后,难以忘怀的感觉。

从那以后,只要讲起贵州省的美丽风光,除了人们时常讲到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风景名胜,我总要补充一句:还有黔东南雨后的林区和湄江的春日美景。

近些年来,遵义到湄潭通了高速公路,再也不走湄江沿岸那些弯拐的公路了。我总是觉得有点遗憾,即使从高速公路走,我也总要找个理由从湄潭的匝道口下来,目的是寻找一下当年的感觉。可惜的是,始终不曾如愿。

近10年来,省里两度聘请我担任

贵州省的茶文化大使,得以年年春天到湄潭县参加茶博会。我不仅了解到湄潭茶的历史,亲眼目睹了遵义红、湄潭翠芽享誉全省,传播到了全国不少省份,还饱览了湄潭的茶海及各处山地无限美好的风光。

但实事求是地说,40年前在湄江边看到的湄江春色,我再也没有见到了。

为此,每年到湄潭住下来,在短暂的会议间隙,我总要独自走到湄江边去,问眼前的山山水水也问自己,湄江难以形容的春天景致,躲到哪里去了?

可能正是想得久了,有一晚从梦境中醒过来,我突然发奇想,湄潭县现在已经是茶叶名县,除了巩固遵义红与湄潭翠芽的品牌,还应打造一个高档茶叶的名牌,名字就叫“湄江春”!

不要忌讳我在这里提高档两个字。

上海现在有8000多家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一般的咖啡二三十元一杯,明码标价的高档咖啡达100多元一杯,我因工作和职业关系,也曾偶尔去品鉴过。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种高档咖啡的座位必须得预订,贸然地走进去,人家还不接待哩!

这说明,高档的咖啡座,还有点紧俏。

湄潭县的茶叶有60多万亩,应在好中选优、好中选特的基础上,推出一款高档的湄江春。

让人一喝到湄江春,就像看到了湄潭的美丽风光,嗅到湄潭春天的气息,感受到贵州山地乃至祖国大地山、水、林、洞的神奇和奥妙。

哦,我热爱湄江的春天。

我期待明年的这个时候能品尝到一款湄江春茶!

陈云与古籍整理

曹应旺

曹应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曾担任《陈云传》副主编,参加撰写《邓小平传》,著有《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抗战时期的毛泽东》。

陈云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发言时说:“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表现在尽责上,这个责任就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而奋斗,民族复兴包括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陈云由于家境清贫,一生的学历基础只有高小毕业。仅从这个学历基础来看,陈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上难以有大作为。可事实却并非如此,陈云在这方面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在组织整理古籍上。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不仅由于读了许多进步书籍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也由于读了不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而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重视孔子的许多文化观念,如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他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也重视《四库全书》的文化集成作用,并要求对古籍进行整理。1977年6月,他在杭州评弹座谈会上说:“《四库全书》你们看见过没有?可以去看一看,浙江就有一部。1923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去看过一次。这次来又去看了一次,已经54年了。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那些古书进行圈点。中国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好难看懂。如果圈点,就容易看懂了。”这段话既体现了《四库全书》在陈云心中厚重的文化分量,也表达了他通

过整理古籍传承和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愿。

1981年4月,陈云就整理古籍问题谈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中华文明5000多年没有中断,包括汉字和古籍在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陈云提出“理工工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这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希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三纲”那样的糟粕,但更多的是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屠呦呦从中医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青蒿素就是一个有力证据。

如何整理古籍?从整理的内容上,陈云指出:“仅作参考、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解决。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从整理的组织领导上,陈云提出“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从整理的财力和人力保障上,陈云提出国家要给予财力支持,人力上“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陈云对整理古籍的谈话,后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对整理和保护古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年后的我》

凯里市铭德高级中学 G044 班 龙福顺

無知良
學致知
知之之外
更無

王陽明語錄一則
甲辰秋左冷葉七歲書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三(14)班 左冷叶 书

秦始皇与五尺道

范同寿

范同寿,贵州贵阳人。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作10余部。

或许因为秦王朝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研究贵州历史的学者们,对秦朝时的贵州情况几乎都是一笔带过。其实,在秦王朝统治期间,贵州高原已经纳入了封建国家的版图,中央政府的许多措施,在贵州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时,并没有让贵州成为例外,这一点是有许多史事可以佐证的。《史记·西南夷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秦时,命常頌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由此可见,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应是秦王朝推行郡县制计划的一部分。

看一下秦帝国的版图就会发现,秦朝时的贵州地区早已不在化外,属于西南边陲之内。当时的情况是:夜郎之北有巴郡、蜀郡,东有黔中郡,南有象郡,除夜郎的中心腹地外,其他地区全部属以上四郡管辖。秦朝巴郡的管辖地北面至川南,西至今贵州赤水一带,东、南两面抵乌江。黔县为巴郡的辖县,今遵义市市区、绥阳、桐梓、仁怀都在其境内。蜀郡的北面也抵川南,西面到云南的镇雄,东面至赤水、息烽一线,南面抵六冲河,包括今贵州的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等地区均在其辖境内。黔中郡原来就有,属于重置的旧郡,今贵州的印江、沿河以东,思南、江口以北都属该郡管辖。象郡的郡治在今广西,今黔东南独山、荔波一带归属的毋敛县,应是它的辖县。

历史上,行政建置的区位变迁并不少见,但像夜郎游移范围如此大的却不多。石阡位于今贵州东北,安顺则在黔中偏西。百余年间,搬了几百公里的家,这除了证明古夜郎势力和影响之外,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关于秦汉统治者治黔方略的思考。

最早记录贵州与外界交通的历史文献是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只记述了庄蹻率军远征从水路进入贵州,再经陆路入滇的史迹,并没有介绍贵州的古代道路情况。庄蹻本人也只是将贵州作为途经地,没有像在云南那样留下筑城修路之类的遗迹。秦始皇要将他的郡县制推广到西南地区,要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随时予以监控,只有修路才能办得到。于是他下令修建从四川经黔西北至滇西的道路。这条路宽仅5尺(合今3市尺),历史上称之为“五尺道”。

五尺道是贵州境内已知的由官方规划并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道路,在贵州交通发展史上有着极不平常的地位。这条路起于四川宜宾,由云南盐津、昭通入贵州,经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终于曲靖,全长2000多里。

先有人行之路,后有官修之道,大概是古今道路建设的常理。秦始皇的五尺道同样是在自然形成的民间商道基础上建成的。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自己的双脚在川南、黔西北、滇西一带踏出了一条商旅便道,巴蜀商人及西南夷人沿着这条商道同缅甸、印度等通商往来,络绎不绝。

五尺道的修建,满足了秦始皇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的愿望,加强了西南地区与秦帝国的联系。元朝至元年间,马可·波罗曾在这条道上留下足迹。这位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兼商人,从贵州威宁入云南昭通至大关,从大关骑行12天抵宜宾,沿途所见令他印象深刻。他在游记中就五尺道上所见所闻写下了“环墙之城村甚众”“其人形色虽褐而不白晰,然甚美,善战之士也”等生动记录。

秦始皇修建的五尺道,揭开了贵州道路开发的序幕。

周必素

周必素,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博研究馆员。一直从事文物保护及播州杨氏土司历史、考古研究。有《播州杨氏世系考》《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贵州遵义的宋代石室墓》等相关成果。

南诏两次陷播,第一次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第八代国王世隆派遣大将军独彦侵播州,第二年9月即被安南都护李鄣收复;第二次是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世隆再次向东西面发起对黔中一带的战争,播州再次失守,文献记载到此戛然而止,是否收复,只字未提。

但是,总得有人为历史负责。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南诏第二次陷播后不久的乾符三年(876年),播州开始出现一支势力强大的家族——杨氏,站出来喊话说,播州是他家播州鼻祖杨端带兵收复的。

为什么有这一历史故事的发生,我们得看看当时唐朝的情况。彼时,正好唐僖宗李儇即位不久。而在他即位之前的唐王朝,据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读书》中的描绘,已到“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乱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路贿公行,六破也。长史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

杨端入播

人少,九破也”的“国有九破”时。宦官专政严重,李儇是唐懿宗第五子,就是宦官刘行深、韩文约为了便于控制,伪造诏于咸通十四年(873年)懿宗病重弥留之际立为皇太子的,当时李儇仅12虚岁。懿宗于咸通十五年(874年)病逝,李儇于懿宗柩前即位,改年号为乾符。李儇是整个唐朝即位年龄最小的一位皇帝,即位后,因年幼且贪玩,一切朝廷政务均委托宦官田令孜处理,任免官员,都是田令孜决定而不必奏报皇上。土地兼并也很严重,统治阶层奢侈无度,而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因无田而四处流亡,苛捐杂税繁重,加上天灾频繁,矛盾异常尖锐,最终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等发起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唐王朝陷入政局混乱、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窘境。

好战的世隆乘虚再次东侵黔中,唐朝无力应对只好下诏招募勇猛之士前往征讨。在这紧急关头,据宋撰《杨氏家传》,祖籍山西太原在浙江会稽做官的杨端恰好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相告,说这是他功成名就的机会。于是,杨端赴京请缨,得到皇帝的恩准,率兵前往,收复了播州。播州杨端家族的故事从此开始演绎。

对杨端带兵平南入播之事,在南宋时期的杨氏碑铭中有记录。《杨氏家传》中“蜀无壘塞之患,而六诏绝烽烟之警”,即指南诏侵播和杨端平南诏收复播州事。《杨氏神道碑》亦载有“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瑞奉命平定,其功始著”,此“大理”,应为世隆于“咸通元年(860年)自称

皇帝,国号大礼”之“大礼”,而非937年后普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所建立的大理国。所记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之事,是南诏世隆于宣宗年间对播州的第一次发兵而非懿宗、僖宗年间对播州的第二次发兵。

我们要关注战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前文说到南诏在唐懿宗、僖宗时期对唐朝的第三次战争,向北对西川、向南对邕州和交趾、向东对黔中侵犯。其中,因南诏向北对西川、成都地区的大渡河之战唐军溃败,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朝廷发动了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援救,命高骈再次赴西川,随即平定了南诏。

这里有两个巧合。一是平南诏,的确从山西地区招募了兵力入川西,而且恰好在杨端入播的乾符三年(874年)前两年;二是唐廷募兵地之一的河东道,系因辖境在黄河之东而命名,碰巧是杨端的故乡。元代名臣、文学家程钜夫应播州杨氏17世土司杨汉英的请求,撰有《忠烈庙碑》载“杨氏世系太原,唐乾符初,赠大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陷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大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仰思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

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宋濂应播州杨氏21世土司杨铿之请,撰有《杨氏家传》:杨端者,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未能平。僖宗乾符三年

(876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梦神告曰:“尔亟往,此功名机也。”端与舅谢将军诣长安,上疏请行,是南诏世隆于宣宗年间对播州的第一次发兵而非懿宗、僖宗年间对播州的第二次发兵。蛮寇知之,敛退者半。乃诣泸州、合江,径入白锦,军高逸山,据险立寨,结土豪史、蒋、黄三氏,为久驻计。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寻纳款结盟而退。唐祚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卒,子孙遂家于播。

而以后的正史,如《元史·杨赛英不花传》《明史·四川土司传》等官方文献均沿此说。因杨端平南诏入播最先见于杨氏碑铭和《杨氏家传》,均为杨氏自说,而不见于正史的记载,再加上《杨氏家传》对这段历史叙述也极为简略和富于神话色彩,故杨端自山西太原平南诏入播一事,一直备受质疑。杨端其人,是否真实?播州杨氏来自山西太原还是西南土著?杨端是应召平占领播州的南诏来到播州?还是参加了平占领川西的南诏的队伍,收复了川西后,继续南下又收复了播州并世居于此?似乎可以有种种可能。

因年代久远,疑案似已无法厘清,但南诏对川西和播州等地的侵犯,从山西地区调兵平川西、杨氏一族在播州的世袭统治等历史,却是不争的史实。

从唐末开始,号称来自山西太原的杨端家族,在播州世代繁衍,历经27代30位首领,世袭统治播州长达725年,与中央朝廷保持着紧密联系,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未能平。僖宗乾符三年